

盘龙城聚落布局研究

张 昌 平 孙 卓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武汉 430072)

目 次

- 一 遗存的时空架构
- 二 聚落布局及其阶段性变化
- 三 从盘龙城看商代城市布局的若干问题

盘龙城是夏商时期一处重要的遗址,是二里头、二里冈文化向南扩张过程中在江汉地区形成的规模最大的中心聚落。遗址包括城址、大型建筑与墓葬等高等级遗存,保护区面积近4平方公里。多年的考古工作表明,盘龙城遗址文化堆积主要分布在多个岗地上,并由此构成一个遗址群,其外在形态与中原地区同时期大型遗址颇不相同^[1]。因此,研究盘龙城聚落的布局和兴废,对于理解盘龙城的性质^[2],探讨江汉地区与中原文化的关系,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鉴于盘龙城在商代考古中的重要性,学者就其布局已进行过较多探讨。王劲、陈贤一分析了遗址各地点建筑、手工业作坊、墓葬的布局特征,初步认识到盘龙城在不同时期存在着布局变化,并指出遗址不同功能区的规划状况^[3]。许宏从先秦城市研究的视角,检视了盘龙城所包含的中心城址、李家嘴贵族墓葬和周围一般居民区及手工业区^[4]。杜金鹏对宫殿区与城址的内部结构提出了新认识^[5]。

回顾过往的研究,学术界对盘龙城遗址的布局形成了这样的认识,即盘龙城遗址是以城垣及宫殿区为核心,周边分布有墓葬、手工业作坊以及普通居址等不同遗存的大型聚落^[6]。不

-
- [1]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1963—1994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下文简称《盘龙城》报告。
 - [2] 关于盘龙城遗址的性质,李学勤最早提出“盘龙城应为商朝封国的都邑”或者“是商朝南土的一处重要都邑”(《盘龙城与商朝的南土》,《文物》1976年第2期);高大伦提出军事据点说(《论盘龙城遗址的性质与作用》,《江汉考古》1985年第1期)。
 - [3] 王劲、陈贤一:《试论商代盘龙城早期城市的形态与特征》,《湖北省考古学会论文集》(一),武汉大学学报编辑部,1987年;收入《商文化论集》(下),文物出版社,2003年。
 - [4] 许宏:《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67、68页,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
 - [5] 杜金鹏:《盘龙城商代宫殿基址讨论》,《考古学报》2005年第2期。
 - [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231—23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难看出,上述讨论主要集中在对盘龙城不同地点的功能区划分上,且多将不同阶段的遗存压缩在同一个时间点上进行解读。而根据《盘龙城》报告及学者对该遗址年代的认识,盘龙城遗址的绝对年代约当公元前十六世纪至公元前十三世纪。在这三百多年间,盘龙城理应经历了一个从始建到发展、从繁盛到衰落的过程,聚落的中心区和功能区都可能存在变化。因此,以历时的视角,可以更好地观察盘龙城的社会场景及其变化。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自 2012 年开始参与盘龙城的田野考古工作,并计划在未来的考古工作中进一步厘清盘龙城遗址的布局。作为基础工作,我们通过梳理《盘龙城》报告等材料,并结合近年的工作,特别是对遗址的调查与勘探,对遗址布局问题形成了一些初步认识。

一 遗存的时空架构

盘龙城地处大别山丘陵向南延伸的余脉,紧邻东南流向的府河,东侧五公里之外有南流的淝水,两支水系注入长江时地势逐渐低缓,附近地貌多呈低丘与湖泊相间之势。盘龙城遗址东、南分别濒临盘龙湖、府河(图一),其主体分布在杨家湾岗地及向南分支的多个低岗之上,包括艾家嘴、楼子湾——小嘴、王家嘴、李家嘴等,杨家湾西北、隔盘龙湖湖汊为大邓湾——小王家嘴,杨家湾东北、隔盘龙湖为董家嘴。盘龙城东岸的长丰岗一带则有小杨家嘴、丰家嘴和万家汉等地点。据《盘龙城》报告,以上诸地点发现古文化遗存的有王家嘴、杨家湾、杨家嘴、城址、李家嘴、楼子湾以及董家嘴。除这些地点外,同时期的文化遗存在其他岗地的小王家嘴、小嘴、小杨家嘴、丰家嘴和万家汉等地点也有发现。

《盘龙城》报告的编写方式是先划分期别,再分地点介绍遗存。这样的报告形式,特别是将墓葬之外的大部分遗迹出土的陶器等遗物归入地层,让研究者难以对遗址不同遗存进行深入的编年研究^[1]。《盘龙城》报告将盘龙城划分的七期虽略显细碎,但大体合理,并被学者认可^[2]。以下按《盘龙城》报告的分期体系,分别对各地点遗存进行历时性检视,分析其功能及位置关系,并对个别遗存的年代、性质进行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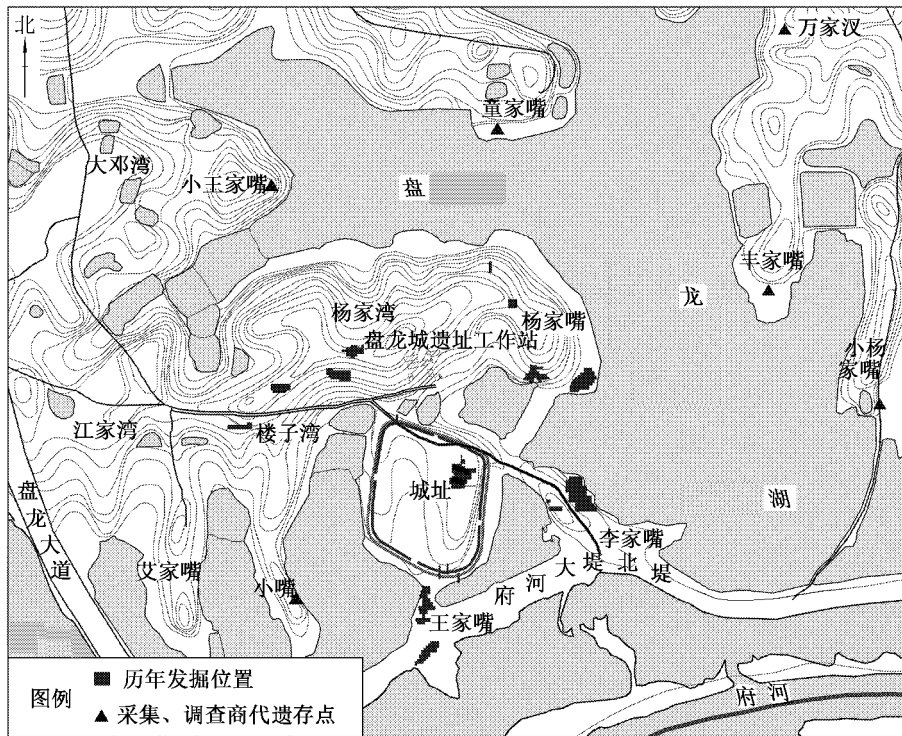
(一)城址

《盘龙城》报告中描述的城址并非是一处独立的自然地理单元,在范围上包括杨家湾岗地之南、王家嘴之北的城垣内外^[3]。从地形图上可以看出,盘龙城城垣是利用王家嘴及其西北部的一个小岗地的自然地势修筑而成,城垣以及城内的地势明显有愈南愈低的特征。在南城

[1] 拓古:《盘龙城与〈盘龙城〉》,《江汉考古》2002 年第 4 期。

[2] 蒋刚:《盘龙城遗址群出土商代遗存的几个问题》,《考古与文物》2008 年第 1 期;李丽娜:《试析湖北盘龙城遗址第一至三期文化遗存的年代和性质》,《江汉考古》2008 年第 1 期。

[3] 将盘龙城 F1、F2 这样的大型建筑称为宫殿,涉及盘龙城遗址是方国还是地方城市的性质判断,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本文仍依流行说法,仍然保持“宫殿”、“宫殿区”称谓。



图一 盘龙城遗址遗迹分布平面图

垣之外，迤迤向南的王家嘴其实只是该岗地的南端。而叠压在南城垣之下的早期遗存，则与王家嘴同时期遗存相连，在城垣修筑之前已为一体。这说明城址兴建前该地已存在较高等级的聚落，而第六、七期时人类活动较少。

在南、北城垣外的探沟中发现“城壕”迹象，深 2.1—4.6 米。而城垣西北部位于岗地高坡，高于南城垣西部约 2 米。北高南低的地势使得城垣外围壕沟很难处于同一平面。《盘龙城》报告所谓的城壕遗迹是否为一条贯通的护城河还需进一步证实。城壕内最底层的堆积属于盘龙城第四期，说明其始建年代不晚于此期。《盘龙城》报告认为，第五、六期堆积已淤平城壕，最接近废弃的时间。第七期壕沟内有少量陶片，说明城址废弃后还有人类活动，这与西城垣发现墓葬的情况吻合。

宫殿区位于城址内东北部高地上，目前发现三座大型建筑 F1—F3，三座建筑沿西北—东南方向分布。在 F2 东南部还发现有“五个大柱础穴和础石遗迹”〔1〕，应该属于另一组建筑。显然，当时的宫殿区并非只有 F1—F3，而是布局较为复杂的建筑群。《盘龙城》报告认为 F1、F2 基址建筑年代属于第四期〔2〕。建筑基址出土陶片具有四期偏晚的特点，叠压基址的地层中则

〔1〕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1963—1994 年发掘报告》，44 页，文物出版社，2001 年。

〔2〕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1963—1994 年发掘报告》，70 页，文物出版社，2001 年。

多见第五期遗物。《盘龙城》报告中关于基址建筑年代的推论比较合理,也为学者所接受〔1〕。

盘龙城城垣大体呈方形,南、北城垣长约 260 米,东、西城垣宽近 290 米,这一尺寸是根据地表突起位置来定位城垣、进行测算的,位置及数据都不十分精准,但城垣规模很小,则是很明确的。城垣的年代是根据城墙夯土中发现的陶片而定,报告归为第四期。此外,在南城垣墙体下叠压有盘龙城第一至三期遗存,包括属于第二期的夯筑台基和灰坑等遗迹。而第七期的遗存则仅见于西城垣中部、打破城墙夯土的出土青铜器的墓葬中。

F1、F2 基址之下还存在属于盘龙城第三期的“黄土台基”和柱础、础石等建筑遗迹〔2〕。这些遗迹处于同一范围,可能相互关联。此外,《盘龙城》报告还指出在位置更北的“F1 东北面下层及 F3 西南面下层均叠压有早期建筑遗迹”〔3〕。这些迹象表明,在第四期宫殿区范围内早在第三期就已经形成了较大规模的建筑或建筑群。

盘龙城的兴废、使用时间是个重要问题。《盘龙城》报告认为“城址的建筑年代应该在盘龙城第四期,盘龙城五期、六期,是城址建成后的使用期”,第七期废弃〔4〕。在认可其对城垣和城壕同时建筑于第四期的判断下,我们对城址的兴废有不同看法。关于兴建,中原地区的偃师商城到洹北商城,都是先筑宫殿后建城垣〔5〕,盘龙城亦有此可能。如前所述,在 F1、F2 等基址建筑之前,已经存在第三期的台基等建筑。在第三期之前,盘龙城聚落只分布在王家嘴一带。第三期“黄土台基”等遗迹是在原居址范围之外兴建的、独立于居址的规模大、等级高的建筑,并奠定了其后宫殿区的位置与范围。因此,黄土台基等建筑应该就是 F1、F2 之前的“宫殿”级别的建筑,它们的出现是盘龙城城址肇始的标志。其废弃年代则较难确认,我们认为大体应该在第六期。根据《盘龙城》报告,这一时期盘龙城城壕已经淤积近平,城垣之内几乎不见第六期的堆积和遗物,与城址关系密切的王家嘴聚落此时已经废弃(详后),特别是与宫殿区相应的李家嘴墓地也不见第六期的高等级墓葬。由此,我们认为盘龙城城址以第三期兴建高等级基址为开端,延续使用至第四、五期,至第六期废弃。

(二)王家嘴

王家嘴位于城垣东南侧的岗地,岗地跨过府河大堤向南延伸。枯水期,王家嘴南端水下还可见绵延的文化层,说明盘龙城原来的文化堆积分布更为广泛,当时水位也较现在低一些。

根据《盘龙城》报告,盘龙城第二期至第五期是王家嘴遗址堆积丰富的阶段,在第二、三期有三座窑址和一座规模较大的方形房址。窑址中有两座长窑(Y1 和 Y2),其长度大大超出目

〔1〕 杜金鹏:《盘龙城商代宫殿基址讨论》,《考古学报》2005 年第 2 期。

〔2〕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1963—1994 年考古发掘报告》,62 页,文物出版社,2001 年。

〔3〕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1963—1994 年考古发掘报告》,44 页,文物出版社,2001 年。

〔4〕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1963—1994 年考古发掘报告》,32 页,文物出版社,2001 年。

〔5〕 张国硕:《商代都城的建设顺序及断代》,《中国文物报》2003 年 12 月 12 日;《试析洹北商城之城郭布局——兼谈大城城垣的建造》,《考古与文物》2015 年第 4 期。

前已知其他商时期的龙窑或长窑^{〔1〕}，且坡度不足，底部高低不平，窑室宽窄不一，都不符合龙窑的特征。不过两处遗迹的确具有窑址特性，考虑到 Y2 在 Y1 南 5 米，颇疑它们是多个集中分布的窑址。湖南费家河遗址的河岸边，就曾见过成组排列的圆形窑址^{〔2〕}。王家嘴的长窑，可能与此类似。王家嘴北部还发现夯土台基^{〔3〕}，表明当时存在较大规模的生产和生活活动。

王家嘴第四、五期遗存仍然丰富，有房址和祭祀坑等遗迹。房址规模较大，位于岗地北部近城垣处，应是贵族住所。《盘龙城》报告所谓的 H6、H7 祭祀坑，分别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和锅底状坑，H7 坑底还铺有朱砂，多随葬青铜兵器、容器，因此我们怀疑两者应为墓葬。盘龙城地区土壤酸性强，墓葬人骨一般朽蚀无存。同时墓葬多埋葬在遗址内，与文化层堆积混杂，在土质土色上也难以辨识。一些所谓的祭祀坑也可能是未被识别的墓坑。而且王家嘴 M1 也位于这一区域，而 H6 为 F7 所叠压，H7 则在 F7 南 1 米，这些都说明当时居葬关系较为密切。

王家嘴聚落在盘龙城第一期就已存在，并且其兴衰与北部的城址关系密切。盘龙城南城垣下的第一期遗存与王家嘴同时期遗存应为一体。第二、三期时，王家嘴则集中分布有居址、窑址和灰坑，遗存堆积较为丰富，并形成一定规模。这种繁盛的局面在第四、五期仍有延续，在接近城垣的北部岗地上，原第二、三期遗存上仍分布较多遗迹。分属第三至五期的 F4、F5、F7 集中在这一带，墓葬也就近分布，聚落的使用具有明确的延续性。不过随着城址的废弃，王家嘴岗地未见第六、七期的遗存，表明在城址废弃之后，此处聚落也随之废弃。

（三）李家嘴

李家嘴已发掘的灰坑和墓葬都位于岗地中部，其中四座墓葬位于岗地南侧，灰坑均在墓葬区域以北。岗地顶部未发现遗迹，推测岗顶堆积已被破坏。墓葬区南部已遭取土破坏，从已发现遗迹的分布来看，这里应该有更多遗存。在二十世纪的考古发掘中，对李家嘴只进行了墓葬和灰坑的清理工作，没有布设探方全面揭露其文化遗存。因此，对李家嘴文化遗存的认知有较大的局限性。

李家嘴发现灰坑三十个，分属第二、第四至七期。灰坑直径、深度多在 1 米左右，坑壁较规整。灰坑之间无打破关系，分布较均匀，未见陶片的 H26—H28 相间约 2 米，排列整齐。盘龙城遗址多见锅底形和坑壁不规整的灰坑，而李家嘴灰坑坑壁多陡直，系人工挖成。考虑到李家嘴存在大型墓葬，或推测其中一些灰坑可能与祭祀相关。

李家嘴的四座墓葬，只有 M2 经过正式发掘，其他三座均是遭破坏后才进行清理的。M2 是迄今所见早商时期规模最大的墓葬，南北长 3.67、东西宽 3.24 米，随葬品仅青铜器就有五十件，其中礼器二十一件。其他三座墓葬遭破坏，从《盘龙城》报告图九十二李家嘴遗迹平面图看，这些墓葬长度与 M2 接近。M3 出土有长达 94 厘米的大玉戈，M3 随葬品出土范围南北长

〔1〕 李玉林：《吴城商代窑址》，《文物》1989 年第 1 期。

〔2〕 湖南省博物馆等：《湖南岳阳费家河商代遗址和窑址的探掘》，《考古》1985 年第 1 期。

〔3〕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1963—1994 年考古发掘报告》，19 页，文物出版社，2001 年。

超过 3 米、东西宽超过 2 米,是盘龙城墓葬中仅次于 M2 的大墓。M1 出土青铜礼器二十二件〔1〕,更是迄今所知殷墟文化之前随葬青铜礼器最多的墓葬。M1—M4 集中分布,相距 6—8 米,其中 M1—M3 东西排列,有明显的规划。《盘龙城》报告将这些墓葬定为第四期和第五期,大体可信。综合上述情况,李家嘴四座墓葬应该是盘龙城同一阶段有明显布局规划的等级最高的一组墓葬〔2〕。

(四)杨家湾

杨家湾是盘龙城内最大的岗地,也是最大的遗址,而且“杨家湾遗址的商代遗迹和墓地遍布整个岗地”〔3〕。杨家湾丰富的文化堆积多集中在盘龙城偏晚阶段。

墓葬在杨家湾岗地的分布广、数量多,目前该地点共发现墓葬二十二座。除杨家湾 M6 年代较早外,大部分墓葬年代较晚,集中于盘龙城第六、七期。其中大型墓葬有杨家湾 M11,被《盘龙城》报告定在第七期,随葬十七件青铜礼器和成组的青铜兵器、玉器等,特别是随葬有装配长秘的勾首刀、透雕的勾云纹刀以及钺等礼仪性青铜兵器,这说明该墓主应为这一时期盘龙城的最高首领。杨家湾 H6 也和王家嘴 H6、H7 一样,应属墓葬。H6 出土多套组合规整有序的青铜礼器,同样表明墓主等级较高,特别是 H6 还出土一件与杨家湾 M11 形制、大小相同的青铜钺,推测 H6 墓主身份与杨家湾 M11 相当。

杨家湾遗址文化堆积丰富,最厚处可达 2 米,这里最早的生活遗迹出现在盘龙城第四期,如 F1 残长达 16.5 米,表明杨家湾此期已有规格较高的建筑。杨家湾主要生活遗存则属于晚期,尤以第六、七期最为丰富。杨家湾 F2、F3 均为地面经过垫土处理、带有柱础的高规格建筑,规模较大。杨家湾也出土较多印纹硬陶器,规格较高,暗示出生活区有贵族居住。

杨家湾一带确也存在更多高等级遗存。2006—2014 年,在二十世纪的发掘区之西,发现一座大型建筑和七座高等级墓葬〔4〕。建筑基址已遭扰乱,复原长度在 40 米左右,规模与城址宫殿区 F1 相当。F4 以西分布有较为集中的墓葬,其中 M17 出土有青铜爵、斝和形制特殊的觚,以及金片与绿松石组合镶嵌的兽面纹饰件。这说明 M17 应为当时盘龙城最高等级墓葬。根据杨家湾堆积特点和 F4、M17 遗物特征,这些遗迹都应属盘龙城第六、七期。总的来看,杨家湾在盘龙城晚段遗存丰富,高规格房址、墓葬等体现出较高的社会等级,F4、M11、M17 以及 H6 应该与当时盘龙城最高统治阶级相关。

〔1〕 《盘龙城》报告对 M1 器类记录相互矛盾,这里是推测的器类数量。见拓古:《盘龙城与〈盘龙城〉》,《江汉考古》2002 年第 4 期。

〔2〕 部分学者认为早商时期尚无有意识地设置独立的墓地,见卞向平:《商系墓葬研究》,56 页,科学出版社,2011 年。

〔3〕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1963—1994 年考古发掘报告》,217 页,文物出版社,2001 年。这一说法虽然在概念上有问题,但描述的情况是属实的。

〔4〕 张昌平:《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又获重大发现》,《中国文物报》2016 年 4 月 8 日第 3 版;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盘龙城遗址博物院、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武汉市盘龙城遗址杨家湾建筑基址发掘简报》,《考古》2017 年第 3 期;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盘龙城遗址博物院:《武汉市盘龙城遗址杨家湾商代墓葬发掘简报》,《考古》2017 年第 3 期。

（五）杨家嘴

杨家嘴处于杨家湾岗地东段，三面为盘龙湖所环绕，东部在枯水期有遗存没入盘龙湖，再次说明二里冈文化时期的水位明显较现代要低。杨家嘴主要发现了一些房址和灰烬沟等，《盘龙城》报告将这些遗迹归为第三至六期。其最早阶段的遗存有一处“黄土台”遗迹，其上分布两排柱洞。柱洞直径不超过 20 厘米，无柱础石，间距一般不足 0.5 米，建筑规模应该不大。

杨家嘴的墓葬规模普遍较小，分布较集中。例如《盘龙城》报告以第二期的 M6 为基点介绍的几座邻近墓葬。同属于第二期的 M8 位于 M6 北 3.3 米，第四期的 M5 位于 M6 南 0.2 米，M7 位于 M6 北 0.5 米，由于这些墓葬均为南北向，排列较规整，应属墓地性质。当然，其他墓葬分布疏密不一，并非有序安排，说明当时有相当数量的墓葬埋葬位置较随意。

（六）楼子湾

楼子湾位于杨家湾岗地及其支系小嘴之间。楼子湾文化堆积较为丰厚，但囿于发掘面积，很难了解这一地点的全貌特征。从《盘龙城》报告发表材料看，楼子湾属于第四、五期的地层堆积较厚，灰坑等生活遗迹也较多，是该地较为繁盛的时期。第六、七期的文化层分布并不普遍。

楼子湾发现墓葬十座，《盘龙城》报告将大部分墓葬归为第四、五期，少数归属第六、七期。M1—M5 分布较为密集，间距不超过 5 米，布局具有墓地的特征。值得注意的是，M2 在《盘龙城》报告图二六二遗迹平面图上显示打破 M3（文字叙述未提及），两座墓葬年代较近^{〔1〕}，这种打破关系大约说明当时对于小型墓地布局缺乏系统的规划。

（七）其他地点与遗存

盘龙城遗址文化遗存不限于《盘龙城》报告中介绍的地点，调查和采集的遗存中也有一些重要信息。

盘龙城城垣规模颇小，是否存在外城垣，一直备受学界关注。2000 年，考古人员根据对杨家湾岗地顶部的调查，推测岗地顶部存在外城垣，外城垣向东沿杨家湾延伸到盘龙湖，西部在楼子湾向南转到艾家嘴^{〔2〕}。由于缺乏发掘等进一步工作，目前并不确定外城垣是否存在。

盘龙城一些地点采集的青铜容器，可能来自墓葬。1985 年，北城垣西北角发现一件青铜罍（PCY：84），这里接近杨家湾墓葬区。1975 年，王家嘴北部采集到一件青铜罍（PWZ：40），同出的有成组陶器和硬陶尊，这些器物都应出自墓葬。上述两件罍器形近似，均为弧腹圜底，年代特征接近二里头文化，或可至二里冈下层^{〔3〕}，报告定为盘龙城第三期。如此，则与北城垣

〔1〕 楼子湾 M3 随葬品丰富，在《盘龙城》报告中定为第五期。楼子湾 M2 随葬品较少，《盘龙城》报告未公布任何图像，而且文字部分以 M2 为第五期，墓葬登记表又定为第六期。

〔2〕 刘森森：《盘龙城外缘带状夯土遗迹的初步认识》，《武汉城市之根·商代盘龙城与武汉城市发展研讨会论文集》，武汉出版社，2002 年。

〔3〕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1963—1994 年考古发掘报告》，412 页，文物出版社，2001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新的铜器》，《考古》1991 年第 12 期；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山西省考古研究所：《1988—1989 年陕西垣曲古城南关商城址发掘简报》，《文物》1997 年第 7 期。

采集斝相关的墓葬也和杨家湾 M6 有一定的关系,后者也属于第三期并随葬青铜器,而王家嘴斝则说明该地点随葬青铜器的墓葬可早至第三期。

盘龙城西城垣以西的小嘴是一条南北向的岗地,调查表明这条岗地的东侧遍布文化层,近年这里又采集到铸类工具的石范^[1]。小嘴或系盘龙城遗址冶铸青铜器的作坊。

盘龙城遗址的外围地区也发现了相关遗存。盘龙湖对岸的童家嘴曾采集鼎、鬲等青铜器,以及玉器和印纹陶等,报告定为第七期,应出自墓葬。在杨家湾岗地以北的小王家嘴,也曾采集过青铜器,近年来经考古工作又揭露出一片墓地^[2]。童家嘴和小王家嘴分布有墓葬,说明盘龙城遗址并非仅限于盘龙湖西岸临近府河的地区。此外,在盘龙湖东岸长丰岗一带邻水岸边,如小杨家嘴、丰家嘴和万家汉也曾发现文化堆积和陶器等遗物^[3]。采集的陶器特征多与盘龙城核心区一致,与整个遗址属于同一阶段。目前采集的遗物仅见陶器和印纹陶,反映出遗存等级偏低,或为城址外围普通居民区。

我们将盘龙城遗址各地点不同期别遗迹列为表一,以便检视。

总体上说,盘龙城遗址是以杨家湾岗地为中心。现有遗存主要分布于临湖、河岸边的岗地,说明遗址形成过程与附近水域密切关联。遗址范围内湖汉岗地相间的地貌景观,显现了其于北方中原城市在环境、资源上的差异。

表一 盘龙城遗址各地点不同期别遗迹

地点	城址						王家嘴		李家嘴		杨家湾				杨家嘴				楼子湾				童家嘴	小王家嘴	小嘴	杨家嘴、万家汉	
	城垣		城壕	宫殿区		文化层	灰坑	墓葬	房址	灰坑	墓葬	文化层	灰坑	墓葬	房址	文化层	灰坑	墓葬	房址	文化层	灰坑	墓葬	房址	墓葬	墓葬	文化层	文化层
一	●					◎																					
二	◎		○			●	○		◎								◎										
三	◎	△			○	◎	●	○	△	◎				○	◎	◎											
四	○			○	○	●	●	◎		◎	◎			○	○	◎	◎	◎	◎	◎	◎	◎				△	△
五	●			○	◎	●	●	○	◎	◎	●	●	○			◎	◎	◎	◎	◎	◎	◎	○				
六	○			○						◎		●	◎	●	◎	◎	◎	◎				○			△		
七	○	○		○	◎					◎		●	◎	●	◎							○		△			

说明:◎●分别表示遗存较少、一般和丰富,△表示发现采集物或遗迹。

[1] 韩用祥:《盘龙城遗址首次发现铸造遗物及遗迹》,《江汉考古》2016年第2期。

[2] 张昌平:《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又获重大发现》,《中国文物报》2016年4月8日第3版。

[3] 武汉市盘龙城遗址博物馆筹建处:《盘龙城东部长峰港商代遗存调查勘探简报》,《武汉文博》2007年第2期。

二 聚落布局及其阶段性变化

作为一处延续时间长、面积大、社会等级高的中心城市，盘龙城不仅应该存在聚落核心区、聚落功能区分，也在布局、环境上有不同阶段的变化。限于目前的资料，以下仅对聚落布局的阶段变化、居葬关系以及环境变化进行讨论。

（一）布局的阶段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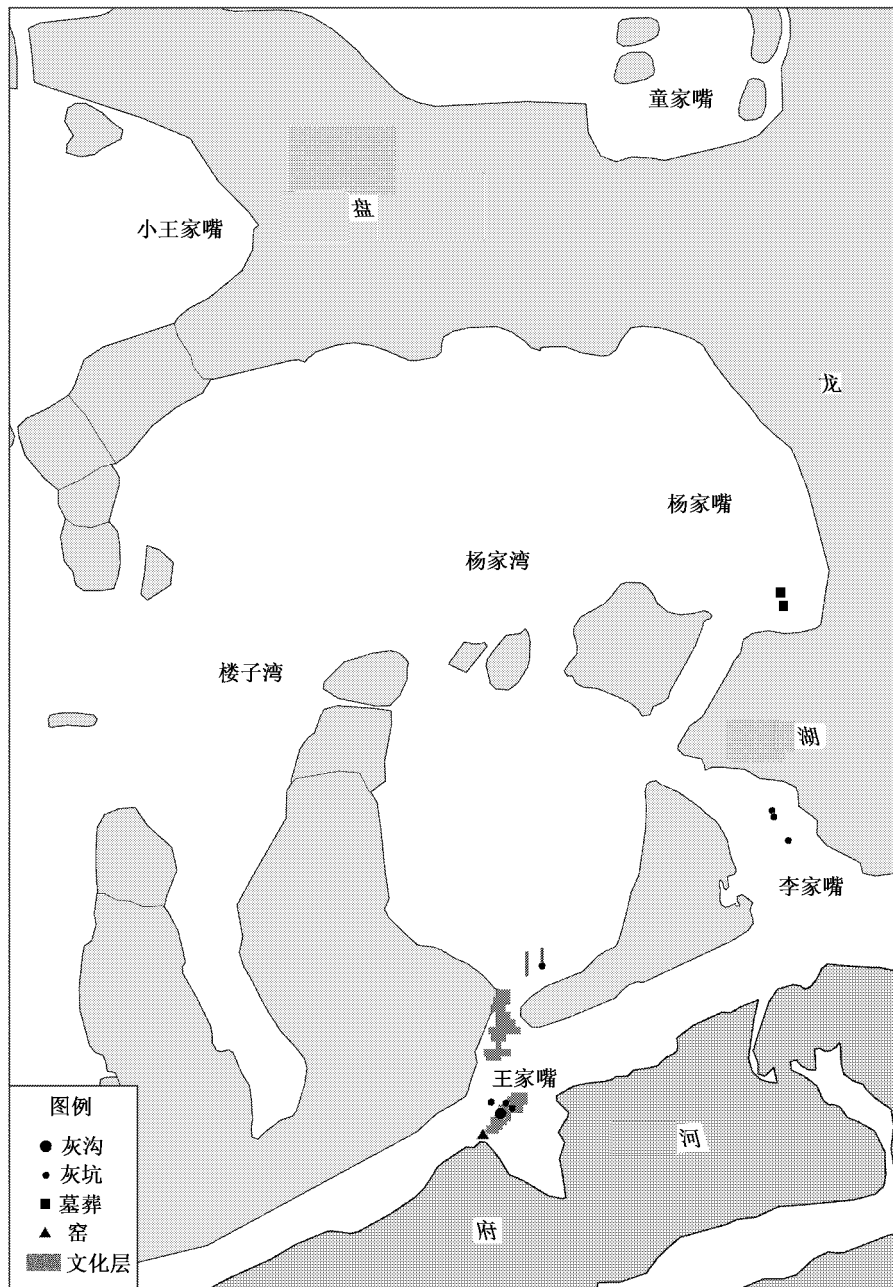
《盘龙城》报告对遗址七期的划分，虽然基本框架被学界认可，但因过于细碎而缺乏普遍性。另一方面，聚落布局的变化频率不同于或慢于陶器的变化频率，因此从较长的时间阶段观察聚落的整体变化，更利于分析当时城市的发展。

就盘龙城而言，大型公共建筑的出现及其变化是衡量城市布局变化最重要的指标。盘龙城城垣、城壕以及宫殿基址并未在兴起之初出现，第一、二期出现的遗存主要是小型房址、灰坑、窑址以及墓葬等反映普通社会生活的遗迹，此时盘龙城尚未形成中心城市，宫殿基址和随葬青铜器的贵族墓葬也未出现。那么，盘龙城的大型公共建筑是在什么时间出现的？如前所述，《盘龙城》报告认为宫殿基址、城垣与城壕基本在第四期同时出现，而第三期出现在城垣东北部的黄土台基，是独立于当时居址之外的大型公共建筑。因此，与同时期中原地区其他城市一样，盘龙城也应该是先建宫殿区，而后建设城垣及城壕。第三期盘龙城开始作为中心城市，社会等级得到了提升，这一期开始出现随葬青铜器的贵族墓葬，这也是聚落升级为城市的重要佐证。盘龙城作为城市的变化发生在第六期，城址区域的文化堆积较少，城壕被淤平，F1、F2等宫殿基址也已废弃。此时，大型建筑在杨家湾出现，高规格贵族墓葬也出现在杨家湾。

基于上述变化，我们以大型公共建筑的使用为标志，将盘龙城聚落的布局变化分为三个阶段，大型基址出现之前的第一、二期为第一阶段，宫殿基址使用的第三至五期为第二阶段，宫殿基址转移到杨家湾为第三阶段。三个阶段的盘龙城有着不同的聚落景观。

第一阶段是盘龙城作为城市的形成时期（图二）。在盘龙城第一期，聚落在王家嘴及后来的南城垣一带开始形成，其规模应该不大，分布在王家嘴岗地南部长约 300 米、面积不超过 5 万平方米的范围。不过此时已形成了丰富的堆积，只是未见高等级的遗迹现象。盘龙城第二期，聚落范围有明显的扩展。李家嘴发现的灰坑、杨家嘴发现的随葬陶器的墓葬都是聚落扩展的直接反映。聚落的社会等级也有明显提高，王家嘴北出现了多处长度在十米以上的基址，其规模远超一般居址，说明公共权力机构或高等级贵族活动场所已经形成。王家嘴发现的青铜镞表明，武装力量对于二里冈下层时期远离王朝政治中心的盘龙城而言，具有军事标志意义。同时，王家嘴还出现印纹硬陶容器等外来贵重物品，说明当时已与长江下游地区存在文化交流活动。

从区域地理上看，这一时期二里头或二里冈文化除了在鄂北地区形成多个聚落之外，其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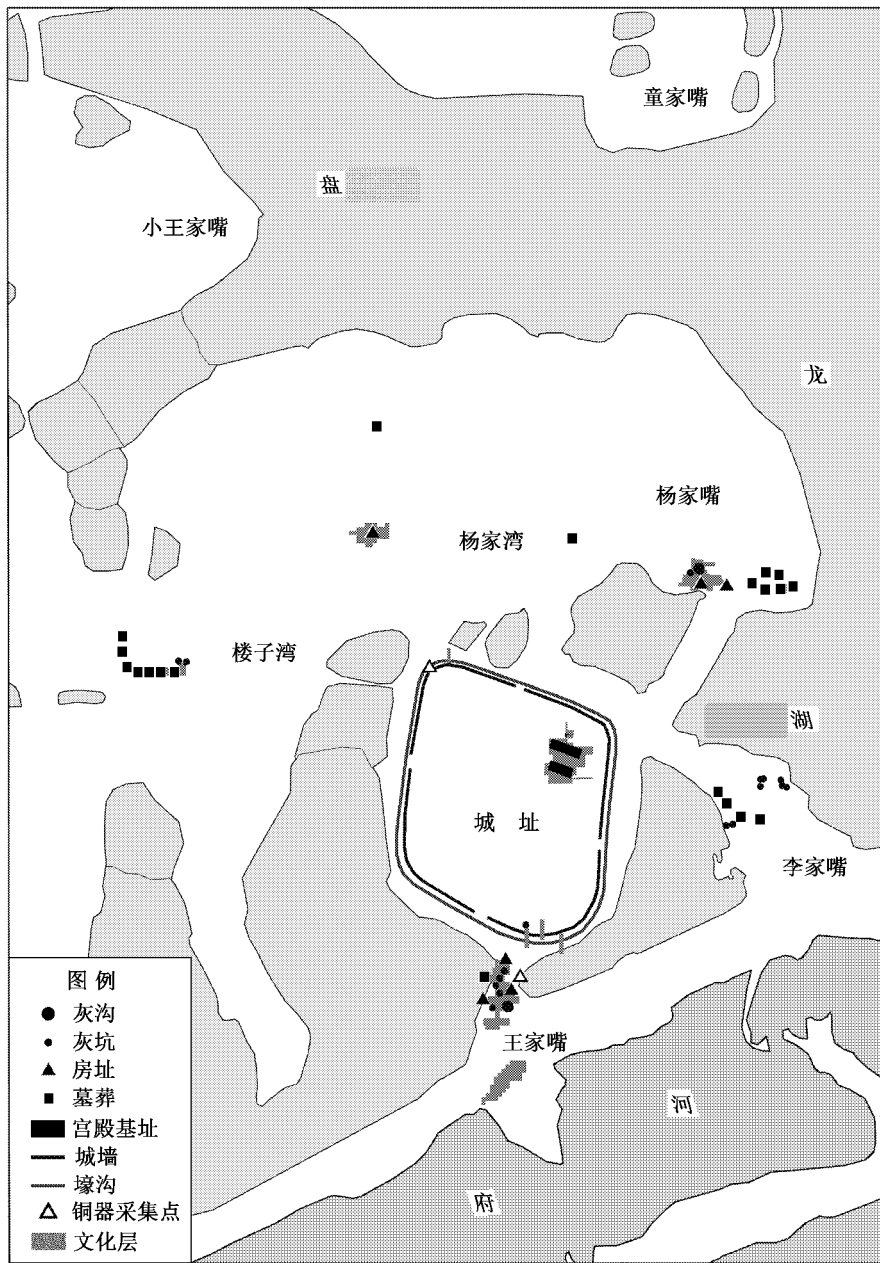
图二 盘龙城遗址第一阶段布局平面图

力西进至江陵荆南寺〔1〕,东及九江神墩〔2〕、潜山薛家岗〔3〕,长江中游一带在文化、政治上似

〔1〕 荆州博物馆:《荆州荆南寺》,31—148页,文物出版社,2009年。

〔2〕 江西省文物工作队、九江市博物馆:《江西九江神墩遗址发掘简报》,《江汉考古》1987年第4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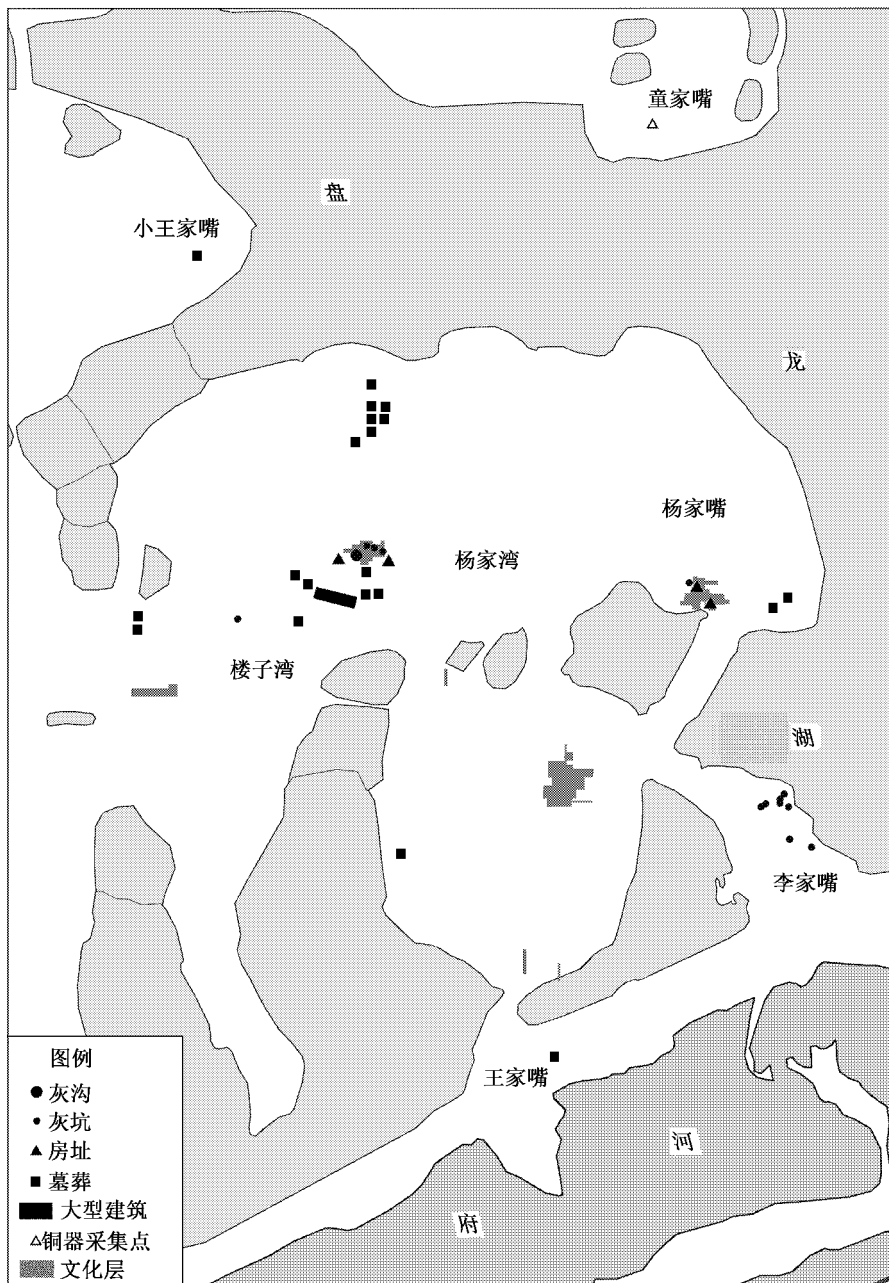
〔3〕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潜山薛家岗》,433—523页,文物出版社,2004年。



图三 盘龙城遗址第二阶段布局

都为中原王朝所控制。从聚落规划、高等级建筑和随葬品看，这一时期的盘龙城可能是中原王朝控制长江中游地区的重要据点。

第二阶段是盘龙城作为中心城市的繁盛时期(图三)。该阶段之初,在其后宫殿区的位置开始兴建大型夯土建筑,这一建筑在王家嘴聚落区之外并独立规划,暗示聚落的进一步分化与蜕变以及权力中心的形成。稍晚,以 F1、F2 为标志的宫殿区形成,其外有城垣拱卫盘龙城,临



图四 盘龙城遗址第三阶段布局平面图

近的李家嘴墓葬区成为高等级贵族埋葬之所，聚落的中心区域辟为最高统治阶层从生到死的专用空间。城垣和宫殿等大型建筑布局规整有序，墓葬规模之大、随葬品数量之多和品质之高不仅在盘龙城的各发展阶段，而且在二里冈文化时期城市中都是绝无仅有的。

在盘龙城城市的形成过程中，南部城垣外的王家嘴是聚落起始地，宫殿区实际是从这里向

北发展的。除王家嘴外,从西部的楼子湾到东部的杨家嘴,都发展成为聚落区。这一阶段的盘龙城,包括王家嘴、李家嘴、小嘴以及整个杨家湾岗地,都成为生活居址。这些聚落点形成了丰富的文化堆积,灰坑、房址、中小型墓葬等分布较为密集,这些都说明聚落曾经的繁盛景象。生活区外,王家嘴等地点长达数十米的灰烬沟证明了较大规模的手工业作坊的存在。小嘴与青铜器生产相关的遗存,反映了城市社会生产具有重要的类别和技术要素。本阶段聚落区范围大大扩展,已经成为一座规模较大的城市,估计当时城市中心区域面积超过五十万平方米。

这一阶段不同规模房址、不同等级墓葬的存在表明盘龙城社会层次复杂,人口较多。许多墓葬,特别是李家嘴 M1、M2 这样的高等级墓葬,随葬青铜器数量多、品质好,印纹硬陶、玉器的数量和类别也大大增加,这些随葬品的资源及制作技术的多样化,显现出盘龙城对于资源与财富获取渠道的多样化。

这一阶段的盘龙城应该具有南方中心城市的地位。盘龙城不仅高等级遗存如建筑、墓葬规模远远超出本地区其他聚落,而且周边聚落如江陵荆南寺〔1〕、黄梅意生寺〔2〕文化面貌表现出与盘龙城的高度一致性,一些长江中游地区地方化的因素如红陶缸在这些聚落中发现较多。随着盘龙城的兴盛,周边聚落数量远多于上一阶段〔3〕,荆南寺还出现随葬青铜器的墓葬,这或可说明这一阶段中原文化的影响在长江中游地区达到顶峰。

第三阶段是盘龙城作为中心城市的衰落时期(图四)。这一阶段盘龙城的重要变化是原有的宫殿区被废弃,新的大型建筑出现在杨家湾南坡,高等级贵族墓地也相应迁移到杨家湾,这或可说明杨家湾已成了新的城市核心。杨家湾 M11、M17 等规模较大,随葬品在该阶段最丰富。杨家湾 M11 随葬的勾首刀、透雕的勾云纹刀等多件新型兵器,杨家湾 M17 出现了中原文化系统中迄今最早的绿松石镶嵌金器饰件,这些稀有的奢侈品可能还带有礼仪性,这都暗示其拥有者在盘龙城身份最高。不过,盘龙城已经开始显现出颓势并最终废弃,杨家湾的几座大型墓葬除 M11 出土大型圆鼎之外,随葬品数量、类别和品质总体不及李家嘴墓葬。杨家湾 M11 出土的不少青铜器装饰、造型简陋,杨家湾 M17 虽出土绿松石金器饰件,但墓葬中青铜器数量并不多,这足以说明盘龙城最高身份者所拥有的财富无论品质、总量还是多样性都有下降。同时,杨家湾作为核心区,宫殿建筑与普通居址没有明显的限界,M11、H6 等高等级墓葬分布零散,核心区的布局、规划都不如此前规整。在盘龙城废弃之前,其地位已经明显降低。

第三阶段遗存以杨家湾岗地及东西两侧的杨家嘴和楼子湾最为丰富,岗地南坡文化堆积丰厚,同时分布有建筑、墓葬等遗迹。考古调查与勘探表明,杨家湾北坡也分布有较多房址与墓葬,说明杨家湾岗地在这一时期人口密度较大〔4〕。从这些情况看,目前发现的疑似外城垣

〔1〕 荆州博物馆:《荆州荆南寺》,31—148页,文物出版社,2009年。

〔2〕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纪南城工作站:《湖北黄梅意生寺遗址发掘报告》,《江汉考古》2006年第1期。

〔3〕 盛伟:《盘龙城遗址废弃的年代下限及相关问题》,《江汉考古》2011年第3期。

〔4〕 一般而言,居民会选择遗址向阳、冬季避风的岗地南坡作为居住区。岗地北坡存在房址,暗示南坡居址较为密集。

可能建于这一阶段。这一阶段的聚落还在向北、向东发展,其中董家嘴是跨过盘龙湖形成的新区,北部的小王家嘴墓葬也属于这一阶段。但这一阶段的聚落又并非全面扩展,在盘龙城城垣、李家嘴虽然仍有文化堆积,但已不甚丰富,这两个地点应是当时核心区向南的延伸部分。而更南的王家嘴,已完全不见文化堆积。至盘龙城第七期,杨家嘴、楼子湾等地点均不见文化层,显现出城市在废弃之前,局部区域已经先行废弃。因此,第三阶段盘龙城城市范围虽未大规模缩小,甚至在局部地区还有所发展,但原有的聚落点不断被废弃,城市在萧条中延续。

本阶段盘龙城大概仍是本地区中心城市,也仍是南方规模与等级最高的城市,最高首领拥有勾首刀、金器等奢侈品,仍有较大数量来自长江下游的原始瓷、印纹硬陶,这说明城市对外功能并没有大的削弱。随着盘龙城的废弃,长江中游一带原有的商文化聚落也一并废弃,这样的联动性也在另一方面说明商文化退出该地区。

上述三个阶段的布局变化,其转变以高等级社会活动场所为重心。当第二阶段盘龙城城址、宫殿、李家嘴贵族墓这一核心区形成后,普通居民点也开始由此前王家嘴向城址四周扩散。第三阶段当高等级遗存出现在偏北的杨家湾时,普通居址也向北发展,并越过盘龙湖到达董家嘴、小王家嘴。可见,在盘龙城聚落的布局演变过程中,高等级遗迹和一般性居民聚落呈现出了一种联动效应,权力中心造就聚落中心。

(二)居、葬等功能区的变化

聚落功能区简单地说包括起居、祭葬以及生产等不同类型的遗存。在盘龙城,房址与墓葬是最常见的两类,它们在时空分布上有很强的关联性。

高等级建筑和墓葬的关联性很强。从城市发展看,当盘龙城聚落只在王家嘴一带建立时,墓葬在稍晚的时间才开始出现,这一阶段也没有出现随葬青铜器的墓葬。第二阶段开始,盘龙城的聚落地位提升,并开始在居住区外兴建独立的大型建筑,这一时间则出现随葬青铜器的墓葬。至盘龙城宫殿区确立,城垣、城壕营建,李家嘴墓地也同时出现,形成这一时期城市的核心区域,盘龙城进入城市发展的繁盛时期,李家嘴墓地和宫殿区同时象征着其地位与财富。第三阶段,原来的城址与宫殿区废弃,李家嘴墓地也停止使用,大型建筑和墓葬组成的城市核心区同时迁移到杨家湾。此时盘龙城城市开始衰退,大型建筑的规模未见扩大,而高等级墓葬随葬品的丰富程度却有所降低。从核心区布局看,大型建筑与高等级墓葬在空间位置上紧密相连。李家嘴墓地 M3 西距宫殿区不足 200 米,杨家湾 M11 和 H6 西距大型建筑 F4 不足 100 米,杨家湾 M17 东距 F4 不足 20 米,这都反映了居、葬一体的社会观念。不过,第三阶段杨家湾大型墓葬 M11、M17 和 H6 分布较为松散,远没有李家嘴墓地紧凑。此阶段宫殿一带的布局也较为凌乱,反映出此时盘龙城核心区域缺乏整体规划,城市核心的凝聚力下降。

普通居址与小型墓葬在分布上关联性也很强。第一阶段盘龙城聚落范围和密度不大,墓葬少见。至第二阶段,除了城址和李家嘴墓地这一核心区以外,普通居址范围内普遍发现小型墓葬,其中与城址邻近的王家嘴、楼子湾居址文化层堆积丰富,墓葬数量也较多。杨家嘴的文

化堆积丰富,墓葬数量也较多,并延续到第三阶段较早时期,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在第三阶段,随着杨家湾成为城市核心区,这里同时也密集分布普通居住区,这一岗地普遍都有墓葬分布。另一方面,这一时期居址在王家嘴到城址一带明显收缩,而在遗址南部从王家嘴到李家嘴也没有发现小型墓葬。

普通居址与小型墓葬在空间分布上更加近密。从王家嘴到杨家嘴,各个地点所见的小型墓葬,都分布在聚落区范围内。而核心区外围如杨家嘴、楼子湾等地点的墓葬,规模往往都较小,这是居葬关系近密的体现。每个地点居址与墓葬的延续阶段都接近,且居址还多见与年代相近的文化层发生叠压或打破关系的情况。王家嘴发现的三座墓葬均与同时期居址距离较近,甚至为房址所叠压。与李家嘴等大型墓葬有城垣与宫殿区相隔的情况不同,小型墓葬应该多是就近分布在聚落之内,居、葬关系密切程度可见一斑。

小型墓葬虽未像大型墓葬那样规划严整,但一些墓地布局还是经过规划的。楼子湾发现的五座墓葬,成排安葬,间距都不超过5米。杨家嘴M6等四座墓葬分布密集,其中的三座墓葬间距在一米以内。墓葬排列如此密集,显然是有意识安置的,应该属于墓地性质。不过小型墓的分布又表现出松散的特性,楼子湾和杨家嘴除了分布密集的墓葬之外,还有相当数量的墓葬彼此间距数十米,比较分散。目前发现墓葬数量最多的杨家湾,小型墓葬彼此距离较远,没有明显的墓地布局特征,除了其墓葬延续时间较长外,或许与第三阶段此地处于核心区、小型墓葬墓主只处于该区域社会边缘相关。

《盘龙城》报告认为,属于第七期的城垣M1打破了西城垣墙体,并将其视为是第七期盘龙城城址遭废弃的主要依据。但是,属于第七期的文化堆积在城垣一带也有发现,城垣M1正是居葬关系密切的体现,与城址的废弃无关。实际上,M1下葬时城址已经废弃,该墓葬和同时期的堆积都是城址废弃后普通社会阶层活动的遗存。从其他同时期的城址来看,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均可见城址使用时期墓葬打破城墙的现象〔1〕。城址的废弃与墓葬打破城垣并无必然联系,这应该是区别于东周时期城市研究的认识。

童家嘴、小王家嘴发现的墓葬目前还缺乏详细的信息,无法判断是否存在对应的居址。盘龙城目前可统计的墓葬有五十三座,其中随葬青铜礼器的墓葬有三十七座,比例高达百分之七十。虽然有不少随葬陶器或无随葬品的墓葬未被辨识,但数量和比例已远高出郑州商城,这无疑暗示盘龙城聚落社会结构的复杂性。

除居址与墓葬外,盘龙城较为明确的生产活动遗存较少。《盘龙城》报告和一些学者曾对遗址手工业作坊进行过讨论〔2〕,但也仅限于性质指认。例如,《盘龙城》报告认为盘龙城各个

〔1〕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1953—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199、210、211页,文物出版社,2001年;王学荣:《河南偃师商城遗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述评》,《考古求知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2〕 王劲、陈贤一:《试论商代盘龙城早期城市的形态与特征》,《湖北省考古学会论文集》(一),武汉大学学报编辑部,1987年。

地点不同时期都存在作坊遗迹,此外“在西城垣与楼子湾之间,北城垣与杨家湾之间的一片湖汊,也分布着许多作坊遗迹”〔1〕,这些作坊遗迹一般指出土较多红陶缸等遗物之地,并未报告作坊结构或相应功能的标志物。盘龙城遗址可能属于作坊性质的是大型灰炆沟,这种遗迹在王家嘴、杨家湾、杨家嘴均可见到,沟长 30—50 米,内填较多黑灰土,并出土红陶缸或较多陶片。同时,这些遗迹多与居址活动频繁时期的堆积并存,它们的性质应该是接近的,但目前难以判明其确切性质。此外,除宫城区,城垣以内的布局也不清晰,城址堆积情况不明。因此,对于与生产活动相关遗存的揭示,将是盘龙城今后田野考古工作中的重点。

(三)地理环境的变化

研究古代遗址地理环境的变化,实际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后世环境变化对古代遗址的结构或埋藏环境的改变,一是聚落形成过程中当时环境发生的改变。

盘龙城地区古代文化层下的原生堆积主要为第四纪网纹红土,此类土壤堆积普遍,一般厚达数米,红土的结构只在低地因湖相沉积的侵蚀而稍有改变。红土的酸性较强,遗址中有机质遗物难以保存,盘龙城墓葬中难以发现葬具、人骨,即为此故。网纹红土的另一特性是颗粒细腻,密度较大,黏性较强,具有较强的保湿性。同时,盘龙城所在区域低丘与湖泊相间,陆路交通并不便利。

除夏商时期文化遗存外,盘龙城一带古人类活动不甚频繁。在杨家湾曾经采集到个别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打制石核石器,但未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存。结合《盘龙城》报告和我们近年调查发掘的情况,盘龙城商时期聚落废弃之后,这一地区长时间少有人类活动〔2〕。盘龙城遗址晚期堆积中偶见宋、清时期瓷片,在其西的甲宝山一带,有两宋时期墓葬〔3〕。可能由于晚清时期武汉作为通商口岸之后,城市快速发展,人口大大增加,盘龙城常居人口开始增多,因此在小王家嘴、江家湾以及董家嘴等地均发现晚清墓葬或文化堆积〔4〕,民国时期仍有村落。明朝晚期武汉地区城市化加速、人口大增以前,盘龙城少见夏商时期之外的古代遗存。事实上,盘龙城地区的地理环境并不十分适合古代居民生活,这是我们讨论盘龙城遗址性质时需要注意之处。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因防汛要求,盘龙城地区村民从近湖低地向杨家湾、江家湾、小王家嘴等岗地搬迁,并在杨家湾岗地等地点形成了目前盘龙城所见的村落布局。盘龙城遗址公园建设之前,遗址一般保护区村民总人口不超过 500 人。除了在生产活动中挖出墓葬以及居住活动对杨家湾南坡一带商时期堆积有所破坏之外,当代居民对盘龙城遗址地貌没有大的干扰,

〔1〕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1963—1994 年考古发掘报告》,396 页,文物出版社,2001 年。

〔2〕 《盘龙城》报告在介绍南城壕中段层位时提到第 2 层出土六朝至明清时期的瓷片。我们认为报告的年代描述只是泛指晚近时期,而非包括六朝等不同的阶段。

〔3〕 武汉市盘龙城遗址博物馆筹建处:《盘龙城“澜桥康城”工地宋墓清理简报》,《武汉文博》2009 年第 4 期。

〔4〕 武汉市盘龙城遗址博物馆筹建处:《盘龙城董家咀遗址调查探讨简报》,《武汉文博》2007 年第 3 期;《盘龙城杨家湾遗址在发掘前清理地面建筑过程中采集的文物》,《武汉文博》2011 年第 2 期。

诸如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平整土地或人造梯田等生产运动,也未在盘龙城进行大规模改地活动。1988年,盘龙城遗址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区内的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工作日益受到重视。由此,我们认为盘龙城夏商时期遗址地貌总体变化不大。

盘龙城现在的地理环境较夏商时期已有所改变,主要是缘于长江中游河道的淤积、河床抬升造成水位的上升。现在枯水季节,王家嘴遗址南端仍然在府河水平面之下。也就是说,夏商时期盘龙城还包括今天盘龙湖水位线以下的一些地区。水位的变化直接影响到我们对古代景观的判断。从今天的视角来看,盘龙城的遗迹都分布在岗地上,岗地之间遍布湖汉,但在夏商时期这些湖汉可能均为陆地,各个居址则连成一片〔1〕。

水力侵蚀也是改变聚落环境的重要因素。我们知道,黄河中下游地区古代聚落多处于平原,晚期水力作用主要是下切或泥沙覆盖。而长江流域一些遗址位于岗地,雨水的冲刷造成文化层流失。因此,盘龙城遗址多数房基结构不明,可能是居址废弃后雨水侵蚀所致。另一方面,小嘴、杨家嘴遗址等处于水位波动范围的文化堆积容易受到湖水侵袭破坏。枯水期在王家嘴、小嘴一带地表露出陶片、遗迹单位,都是水力侵蚀的结果。

盘龙城不同时期聚落位置也有变化。第一阶段聚落主要分布在王家嘴,第二阶段围绕城址分布,第三阶段则以杨家湾为中心。虽然这种位置变化可归因于宫殿等高等级活动中心的转移,但宫殿区迁移的背景是什么?从地理环境的角度看,这些变化表现出三个方面的特征。其一,聚落整体向北发展。从王家嘴到城址到杨家湾南坡,聚落中心不断北移。从第二阶段的杨家湾、楼子湾,到第三阶段的童家嘴、小王家嘴,每一阶段新出现的聚落点都在最北部。其二,聚落海拔有越来越高的趋向。第一阶段的聚落分布在今王家嘴、杨家嘴东部、李家嘴北坡,均属于低海拔地带,海拔高约20米。第二阶段聚落中心的宫殿区F2西南角础石海拔26.3米,新开辟的楼子湾、杨家湾都较王家嘴海拔高。第三阶段杨家湾南坡建筑基址西南角础石海拔31.4米。其三,盘龙城各个聚落点均邻近盘龙湖,聚落分布有明显的向湖性特征。在聚落发展过程中,没有向西部更高的、远离湖区的方向发展,而第三阶段新的聚落点童家嘴、小王家嘴距离杨家湾南坡中心稍远,但却也邻近湖区。上述北移、迁高、向湖等变化的背景,目前还难以解释,这也是未来考古工作的重点。

三 从盘龙城看商代城市布局的若干问题

盘龙城遗址所发现的聚落具有典型的商文化特点,并在早、中商时期一直与中原文化同步发展。比较盘龙城遗址与中原地区同类遗址,可以更为深入地了解这一时期城市布局和社会结构。

〔1〕 这一认识仅为假设,早期遗址的景观变化还有待进一步的水下遗存探测和三维地形测绘。

目前发现的早、中商时期性质比较明确的城址约有八处,其中属于都城级别的有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和洹北商城三处。偃师商城考古工作时间较长,学术界对其布局的认识较为清晰。偃师商城是由宫城、小城和大城组成,早期以小城和城中偏南的宫城为核心,外围分布手工业作坊、普通居址和可能为府库类的特殊遗迹。晚期宫城得到了修葺和扩建,并在小城的基础上修建了大城。扩建后的大城面积达到 190 万平方米,将早期城垣外的居民点和手工业作坊纳入其中〔1〕。

郑州商城考古工作时间最长,但因其位于市中心,遗存多遭破坏,其整体布局不甚清楚。郑州商城目前可确认有内城垣和外城垣两道城墙〔2〕,内城面积 290 万平方米,明显大于偃师商城。外城垣不完整,但范围很大,应该是较晚时期的扩建。在内城的东北角发现大面积的夯土建筑,推测为宫殿区〔3〕。而在内、外城垣之间,零散分布普通居址、手工业作坊和墓葬等遗迹。此外,在宫殿区附近也发现了夯土城墙,表明郑州商城可能存在宫城遗迹〔4〕。

洹北商城使用时间较短,主要由宫城和外城垣组成,外城垣基槽南北长 2200、东西宽 2150 米,其性质应该与郑州商城外城相同。在外城垣西南角还分布有小城〔5〕。宫城内发现大型宫殿基址两处〔6〕,而宫城之外则分布不同形态的夯土建筑〔7〕,应为普通居民点。上述三处城市,体现了当时的都城规模与布局情况。此外近年发现的小双桥遗址也被部分学者认为属于商代都城〔8〕,可惜目前对其结构及性质的认识还不充分。

除以上三处都城遗址之外,这一时期的中心城址还有垣曲、府城、东下冯、望京楼等。垣曲工作开展较多,发表资料也较为全面。其营建可追溯到二里头晚期,利用地势形成了类似环境的聚落。至二里冈下层晚段,开始出现近方形城垣、道路,并在城内设置普通居民点,这一时期手工业遗迹则零散地分布在居民点内。垣曲的城市发展在二里冈上层达到顶峰,核心区域内出现了南北向、前后两处平行的大型夯土建筑,外围为廊庑或院墙,应为宫殿区。同时在居民

〔1〕 王学荣:《偃师商城布局的探索和思考》,《考古》1999 年第 2 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商城》(第一卷),727、730、731 页,科学出版社,2013 年。

〔2〕 河南省博物馆、郑州市博物馆:《郑州商代城遗址发掘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7—23 页,文物出版社,1977 年;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郑州商城外夯土墙基的调查与试掘》,《中原文物》1991 年第 1 期;《郑州三德里、花园新村考古发掘简报》,《郑州商城考古新发现与研究》,228—241 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 年。

〔3〕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1953—1985 年考古发掘报告》(上),230—232 页,文物出版社,2001 年。

〔4〕 已有证据表明,在郑州商城宫殿边缘处有类似夯土城墙的防御设施,怀疑为宫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1953—1985 年考古发掘报告》(上),233—234 页,文物出版社,2001 年。

〔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洹北商城遗址 2005—2007 年勘探简报》,《考古》2010 年第 1 期。

〔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洹北商城宫殿区二号基址发掘简报》,《考古》2010 年第 1 期;《河南安阳市洹北商城宫殿区 1 号基址发掘简报》,《考古》2003 年第 5 期。

〔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洹北商城遗址 2005—2007 年勘探简报》,《考古》2010 年第 1 期。

〔8〕 关于小双桥遗址的性质,部分学者认为可能是商仲丁所迁之囂都。陈旭:《郑州小双桥商代遗址即囂都说》,《中原文物》1997 年第 2 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小双桥》(下),738、739 页,科学出版社,2012 年。

点外有较集中的制陶、铸铜作坊,手工业的专业化进一步加强^[1]。焦作府城与垣曲的情况较为相近,早期聚落也可以追溯到二里头晚期,并于二里冈下层出现城垣和大型的夯土建筑,近方形的城垣内修筑有南北向、前后两重院落的大型夯土建筑,或属于宫殿基址^[2]。近年发现的新郑望京楼城址也是方形城垣内布置大型夯土建筑,并分布有一般性的居址和手工业作坊,城内由井字形道路连接^[3]。而在该城城垣以北有一条东西向的外壕,城垣与壕沟之间分布有同时期文化遗存,应属于城垣外围的居住区。夏县东下冯城址的北部破坏严重,从存留的部分判断,聚落规模不大,南部有曲尺状城垣,内有圆形建筑基址,成排分布,结构特殊,应为仓库或其他特殊遗迹^[4]。东下冯目前也未发现大型夯土建筑群或手工作坊,或暗示其不同的布局形态,城市可能存在特殊功能^[5]。

已有学者指出早商及中商时期的城市,在布局规划和筑城技术上有一些规律性的特征,体现了这批城市在形成过程存在共同的文化背景^[6]。就城市规模和布局而言,从郑州商城到洹北商城等都城级别的城市,明显有别于其他区域性城市。盘龙城第二阶段城市^[7]与垣曲、府城、望京楼等区域性中心城市具有相似特征。这些聚落的出现多可追溯到二里头晚期,并在二里冈下层阶段开始营建方形的城垣、大型夯土建筑等。除了邻近都城区域的望京楼城址聚落规模较大之外,盘龙城和其他几个城市的规模都不大,城垣内面积都未超过 20 万平方米(表二)。盘龙城 F1 基址长近 40、宽约 12.3 米,垣曲商城 3 号台基长约 41、宽 11.5 米^[8],与盘龙城 F1 大小相近。此外,盘龙城宫殿基址位于城东北角,宫殿基址呈前后二殿的布局特征,与垣曲商城、府城商城相同。

在聚落布局上,盘龙城第二阶段的城市也与中原诸城址特征接近。这一时期盘龙城以城址为核心,其外围分布普通居址,城址内、宫殿区外可能还有居址。中、小型墓葬则靠近相关的居址区。这样的布局特征在郑州、偃师、洹北等都城级别的城市中均可见到,大约是当时城市布局的一般原则。属于地方中心城市的垣曲、东下冯商城等普通居民区也未与宫殿区完全隔离,只是分布于大型建筑外围,而墓葬在居址附近同样都是较为普遍的现象。当然,

[1] 中国历史博物馆田野考古研究中心、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垣曲县博物馆:《垣曲商城(二):1988—2003 年度考古发掘报告》,616—643 页,科学出版社,2014 年。

[2] 袁广阔、秦小丽、杨贵金:《河南焦作市府城遗址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00 年第 2 期;袁广阔、秦小丽:《河南焦作市府城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0 年第 4 期。

[3]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望京楼二里岗文化城址初步勘探和发掘简报》,《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1 年第 10 期。

[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夏县东下冯》,148—153 页,文物出版社,1988 年;杭侃:《夏县东下冯的圆形建筑浅析》,《中国文物报》1996 年 6 月 2 日。

[5] 刘莉、陈星灿:《城:夏商时期对自然资源的控制问题》,《东南文化》2000 年第 3 期。

[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236—237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年。

[7] 《盘龙城》报告认为遗址东西长 1100、南北宽 1000 米,即面积为 110 万平方米,这是包括湖区的面积,同时报告未列入杨家湾岗地以北的区域。盘龙城遗址的范围与面积,其实还有待进一步的工作勘定。

[8] 中国历史博物馆田野考古研究中心、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垣曲县博物馆:《垣曲商城(二):1988—2003 年度考古发掘报告》,413 页,科学出版社,2014 年。

高级贵族墓葬在盘龙城和郑州商城也多靠近宫殿基址等大型建筑，而一般小型墓葬位于相应的居址附近。实际上在更早的二里头遗址，部分规模较大的墓葬位于宫殿建筑之内，有学者认为这批墓葬的墓主有可能即为宫殿的主人〔1〕。从现有材料来看，夏商时期墓葬的分布多位于居址附近或在居住区内，表明这一时期居葬近密是聚落结构的一个重要特征。而从李家嘴、小王家嘴墓地看，有意识规划的墓地在不同阶层均已存在，但在盘龙城零星的墓葬更为多见，又说明墓地并非是普遍性的埋葬选择。盘龙城之外其他遗址还不多见集中的墓地，或可能受到目前考古发现的局限。

面积 区域	遗址	早、中商时期主要城市规模							
		郑州商城	偃师商城	洹北商城	小双桥遗址	望京楼商城	垣曲商城	府城商城	盘龙城商城
宫殿区		40	4.5	41			0.45	0.35	
城垣内		290	190	470		37	19	9	7.54
遗址范围		2500	190		144	168	19	9	110

另一方面，盘龙城在聚落形态上又有自身的特征，暗示其性质较为独特。以盘龙城城市鼎盛的第二阶段为例，与城市布局相关的普通聚落点、墓葬或手工业遗迹等多分布在城垣之外，而盘龙城城垣内现只发现大型的夯土建筑，宫殿区面积不大，城址有明显的高等级居住区的性质，这似乎暗示了在盘龙城高等级群体与一般性居民在空间上有所分化。这与同时期其他区域性城址各层次混居的情况不同。因此，盘龙城的布局似更接近都城级别城市。

就聚落规模而言，盘龙城城址及周边的居民点——特别是夏商时期湖区水位较低的情况下，规模要明显大于其他同时期的区域性城市（表二）。黄河中游地区城市分布较为集中，且区域性城市多靠近都城地区，而盘龙城则远离郑洛地区。这既暗示盘龙城可能属于方国，具有独立的政治地位，也可能说明盘龙城属于商王朝政治系统，但具有更为重要的战略地位。如果结合李家嘴 M1、M2 所体现的社会等级，可以认为盘龙城的地位在早、中商时期较其他区域性城市更为突出，其首领具有更高的社会等级。

盘龙城与中原地区同时期诸城市相比，更大的差异还表现在地理位置和环境上。中原地区城市之间的距离多在 60—90 公里的范围内。从宏观的角度看，这些城市之间相互关联是一种网点式的聚落群，它们构成了夏商文明的中心区域。盘龙城距离郑州商城 450 公里，远离中原政治中心。但是，盘龙城并非孤立存在于长江流域，而与中原地区有密切的联系。从交通线路上来说，盘龙城所在的武汉到郑州之间的京广铁路沿线自古即为交通要道，盘龙城以北的黄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二里头——1959—1978 年考古发掘报告》，157、158 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 年；《中国田野考古报告集：二里头 1999—2006 年》，991—1016 页，文物出版社，2014 年；赵海涛、许宏、陈国梁：《二里头遗址宫殿区 2010—2011 年度勘探与发掘新收获》，《中国文物报》2011 年 11 月 4 日第 4 版。

陂、孝感发现多处二里冈文化时期的遗址，如聂家寨〔1〕、郭元咀〔2〕等。盘龙城向西北通过府河及其上游的沮水可穿过随枣走廊，这是连通中原地区的另一条交通线路，其间有随州庙台子遗址〔3〕，在淅河还发现中商时期青铜器群〔4〕。

另一方面，盘龙城通过长江干流交通又构成了东西向的文化交流带，在长江沿线分布着荆南寺、铜鼓山〔5〕、意生寺、薛家岗〔6〕等以中原文化面貌为主体的遗址，这些遗址基本与盘龙城的兴废同步〔7〕，可见盘龙城中心的区域在长江中游地区向外的张力。在地理环境上，盘龙城位于长江以北、靠近湖区水面的岗地区域，并且在营建的过程中充分利用两条南北向的岗脊形成城垣。起伏不平的地势和近水的地理环境，造就了盘龙城特殊的地貌景观，又方便了城市的对外交通。这样看来，盘龙城地理位置的选择充分体现了它作为商王朝区域中心城市地位，既便于中原王朝的控制与交流，又体现出对长江沿线区域的影响。反观中原地区，城市多分布在平原或河谷地带，城市之间距离较近，彼此交流便利。垣曲商城和东下冯商城分别位于垣曲盆地和运城盆地内部，同时在垣曲与府城城垣以外均未发现文化遗存，似乎较为封闭，而非盘龙城那样外张的态势。

盘龙城聚落的布局既与中原地区早、中商时期地区性城市的一般规划近似，又因聚落的兴衰变迁、地理位置与环境等因素形成一些地域性特征，说明其应为中原王朝二级中心城市。城市历时性的兴衰变化，是中原文化在南方地区进退与强弱态势的反映，也是其所处时代与文化背景的反映，这种变化同时为我们理解商前期城市发展和国家组织提供了很好的材料。

〔1〕 孝感地区博物馆、孝感市博物馆：《湖北孝感聂家寨遗址发掘简报》，《江汉考古》1994年第2期。

〔2〕 孝感地区博物馆：《孝感、黄陂两县部分古遗址复查简报》，《江汉考古》1983年第4期。

〔3〕 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襄樊市博物馆、随州市博物馆：《西花园与庙台子》，148—160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

〔4〕 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县发现商代青铜器》，《文物》1981年第8期。

〔5〕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岳阳市文物工作队：《岳阳市郊铜鼓山商代遗址与东周墓发掘报告》，《湖南考古辑刊》第5集，岳麓书社，1989年。

〔6〕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潜山薛家岗》，433—523页，文物出版社，2004年。

〔7〕 盛伟：《盘龙城遗址废弃的年代下限及相关问题》，《江汉考古》2011年第3期。

ON THE SETTLEMENT PATTERN OF PANLONGCHENG SITE

by

Zhang Changping and Sun Zhuo

The Panlongcheng Site is the largest central settlement formed by the culture of the Central Plains in the valleys of the Yangtze and Han Rivers when it was expanding southward during the Xia and Shang Dynasties. Through the resorting of the excavation data obtained in the past years and referring to the recent archaeological fieldwork,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pattern of the Panlongcheng settlement had three phases of development. Phase I is the forming stage of the Panlongcheng settlement as a city, the core zone of which was located at the Wangjiazui Locality and nearby area in the south of the site. Phase II is the flourishing stage of the Panlongcheng Site as a city, enclosure walls and palaces were built in the settlement center, and large-scale elite cemetery formed at Lijiazui Locality. Phase III is the declining stage of the Panlongcheng Site as a city. The enclosure walls in the settlement center were abandoned, and the core zone of the city was transferred to the south slope of Yangjiawan Locality. During these three phases, the changes of the social activities of the high-ranking classes also had influences to the entire settlement pattern, especially the palaces and elite cemeteries showed corresponding changes with the remains of the common people. Likewise, the distributions of the residential remains and burials of different phases in the Panlongcheng Site also had associating relationships. The large-sized elite burials with bronzes as grave goods were found close to the palace foundations, and the small burials were generally found nearby the residential zones of the common people. In view of the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the change of the settlement pattern showed the tendencies of moving northward and to higher terrain, the backgrounds of which are still waiting for further studies. This paper also makes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among Panlongcheng Site and other city sites of the early Shang Dynasty, and found some regular common features on the layout designs and city construction techniques from them, which reflected the common cultural background of these cities during their forming processes. On the other hand, the Panlongcheng Site also has some special features on the settlement pattern and location, hinting its important role in the expanding progress of the culture of the Central Plains to the Yangtze River Valley. Using the Panlongcheng Site as the representative, we can detect the development journey of the early cities, and understand the controlling mode of the central dynasty to the frontier areas and the situation of the social organizations in the early Shang Dynasty.

责任编辑：黄益飞